

426595

地名志文集



阿坝州方志办公室 编印

一九八九年三月

地方史志文集

阿坝州<sub>方志
地名</sub>办公室 编印

一九八九年三月

序

正当我州各族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取得不断胜利，喜迎新春之际，《地方史志文集》出版了。编委会要我为本书作序，我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将作者、编者们的成就、襟怀、胆略、趣味、情愫展示给广大读者。

编纂地方史志、地名资料，原本是我州一项规模空前的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的系统工程。《地名录》丛书，近年来已出版十数部，三种文字印行，七百余万字，达数万册，列全省地名丛书前茅。尚余大量资料正进一步研究整理。《阿坝州志》将是一部包括三十多个分志，六十多个业务部门汇编的达三百余万字的地方百科全书和古今总览。是我州第一部严谨、朴实、科学地反映州情地情的资料文献。它的作用是“资政、存史、教育”，为四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地方基础信息。这本文集的编选，是我州方志、地名工作阶段性成果的一次检阅；是对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发掘和整理，反映出今天的时代精神和各族人民开拓前进的步伐。

《宗教篇》突出了藏区信教和藏传佛教的特点，对“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环境相适应”的重大问题加以研究，

指出“藏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宗教制度发生的深刻变革，藏传佛教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背景下的自我完善和补充”。作者并不一味给新形势下的宗教捧场，而是按客观事实论证：“喇嘛教至今仍有不少地方与社会主义环境不相适应的一面，甚至直接矛盾……。消极性不能低估”。文章最后引用马列精辟论断作为奋斗目标，为宗教政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论据。

《史实探讨》栏目中《八角事件》和《金川之役》都是我州近代史上的要闻。后者是乾隆十大功勋之二，战争规模罕见，影响十分深远。现根据实地调查，寻觅到新的文字和口碑资料，得出“一管之见”，得到国内外一些专家支持，望能引起讨论，以利推进史学研究的新发展。

《地名论释》，是大量第一手资料的继续论证和考析。为“地名是民族历史文化的见证”论断，探索追溯，展示出历史民族、民俗、宗教、文化诸方面的史实。

《唐蕃蜀西史料》辑录了一千二百年前唐蕃关系史中的我州部分。是对旧史志整理的重要成果，记录了藏汉民族之间历史上的珍贵友谊；《懋功厅乡土志》注释，言简意赅，对编修新志具有借鉴的价值。

《民国林政》，是近二万字的资料长编，州《林业志》编者能发掘出如此丰富的史料，对历史虚无主义者是有力的抨击。

《民族源流》，记述考析了岷江上游石棺葬民族的历史，揭示“十八土”地区先民们的原始联系。有助对我州民族史志的编纂，扩展了线索。

《史志人物》传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览阅传记，使

我们认识到历史人物传记是他们自身言行所写成，同时把我们引向历史发展的背景，使我们懂得了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卓越人物创造历史的个人作用。每一位重要人物都不是随心所欲地根据主观幻想去改变现成条件，只有当他们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时，主观能动性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史志论坛》中《文风浅论》堪称精彩，提及一位“客里空”记者犯罪受审，问他“街道”，他立即说“穿着节日盛装的街道”。问他“人群”，他接“熙熙攘攘的人群”，提到“清晨”，他接“晨曦初露的清晨……”对答两小时全是油腔滑调，与个人情绪、意念，毫不相干。这个笑话对于史志界那些自命天才，捕风捉影，不重实际的“文人”敲了一声警钟。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文人不可与谈修志”，指的就是这类毫无科学态度，只重编造情节的人，是修志之大忌。我们提倡“坐冷板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调查研究之风和“衣带渐宽终不悔”，“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刻苦钻研精神。为这项千秋大业献身。

本书以州志篇目（讨论稿）结尾，目的在于完善志书的总体设计，先作搜集材料的提纲，后为成书的目录。它要求具备时代特点，地区和民族特点。从指导思想、编写范围到断限称谓、层次布局、篇章结构诸方面，都要作出科学的考究。方志是群体意志的升华，需要发动社会、行政、专家的力量，众手成书。

读毕此书，收益不小，作者和编者们如蚕食桑吐丝，蜂采花酿蜜，奉献出经过博采和初步整理的可贵信息成果，是为迎接我州史志工作的春天所作的努力。精神产品不与物质产品共荣，身之春光不与心之春情相辉，怎能显出春的神

韵？而凭春洒翰，捧箧积资（料），当是治学者之极致。学似春潮陡涨，情即比春水流长。我们伟大的祖国和民族，顺天应人，宏图浩浩，政策昭昭，真是天之道，地之利，人之力，物之宜，万事俱备，唯期万千志者潜心共奋。本书内容丰富多彩，文章深入浅出，形式新颖活泼，风格朴实大方，不少文章有生气，有力度，有时代感；不趋炎媚俗，不轻佻放纵，思想开放，凝重明快，很值得一读。一本好书，就象由无数枝柯蔽日的高木交织而成的森林。若此小序能起到导引读者走进那原始绿野林海探宝的话，便是我最大的欣慰！

泽巴足

一九八九年春节
于马尔康

目 录

宗教篇

- 初探藏区喇嘛教与社会主义环境相适应的问题 朱成源 (1)
宗教、民族、风俗之我见 蒋国俊 (11)
康猫寺 扎秀谢尔让 谢芝 (16)
体教类属初探 燕松柏 (20)
回族不等于回教 杨大建 (27)

史实探讨

- 八角事件是复辟帝制的闹剧 张孝忠 娄春元 (28)
乾隆两度金川平叛是一大历史冤案 雷 丹 (40)
一篇野史——《金川妖姬志》对“一征金川之役”的记叙 李 茂 (59)
“金川之役”评论种种 戈 岩 (68)

地名论释

- 地名标志设置综述 州地名办公室 (74)

试论地名的社会属性和规律	陈 菊	(81)
论乾隆金川之役对地名的影响	谢启茂	(86)
金川得名由来	邓政、晏春元	(94)
“恭州”位置考释	赵平仲	(98)
“筹边楼”考	周 蓉	(100)
地名研究刍议	黄坤久 青 峰	(104)
《地名志》编纂论谈	蜂 鸣 陈 菊	(109)
羌族风情在茂县地名上的表现	任世凯	(114)
壤塘地名特征初探	李纪元	(120)
地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荆良成	(124)
农村地名标志的作用、设置和管理	张荣芳	(131)

唐蕃蜀西史料

唐蕃史料（阿坝部分）辑录	张大年	(136)
--------------	-----	-------

民族源流

论嘉绒藏族的族源	徐学书	(174)
嘉绒藏族及四土土司世系浅谈	政治金	(188)

民国林政

民国时期阿坝州木业和林政概况	《阿坝州志·林业志》编辑部	(201)
----------------	---------------	-------

史志人物

- 安登榜传 叶星光 (227)
索观瀛传 葛艾 (235)
王荫三传 杨心泉 (252)
苍旺洛 余夫 廖永生 (256)

史志论坛

- 修志文风浅论 何发中 (261)
漫谈部门志编写中的问题 孙松寿 (266)
浅谈县志编纂规则 邓政 (269)

旧志整理

- 《懋功厅乡土志》校注 ... [清]兴元撰 杨诗福校注 (273)
《懋功厅乡土志》校注后 杨诗福 (287)

地方资料

- 松潘职业学校驻地黄龙寺 聂瑞潘 (291)
松潘回、汉族学生参加远征军赴缅甸参战亲
历记 马其祥 (295)
北洋军阀吴佩孚逃亡南坪 田瑞泽 (298)
阿坝州安多藏戏简况 刘建 (299)
漩口天彭阙探问 王忠明 (302)

- 理县五屯藏族丧葬仪式简介 桑梓侯 (307)
羌族的试刀面习俗 仲 园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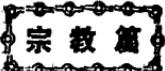
其 它

- 庙宇 (诗歌) 远 泰 (226)
修志对联 田 野 (173)

州志篇目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志》篇目 (第二修改稿)	(313)
篇目修改说明	(311)
卷首 (含概述、大事记)	(313)
卷一 建置沿革志	(313)
卷二 自然地理志	(316)
卷三 人口志	(322)
卷四 民族志	(324)
卷五 党政群团志	(326)
卷六 政法志	(329)
卷七 劳动人事志	(331)
卷八 民政志	(332)
卷九 军事志	(336)
卷十 红军长征志	(339)
卷十一 农业志	(342)
卷十二 林业志	(344)
卷十三 畜牧志	(348)

卷十四	水利电力志	(350)
卷十五	工业志	(352)
卷十六	乡镇企业志	(354)
卷十七	交通运输志	(355)
卷十八	邮电志	(357)
卷十九	城建环保志	(359)
卷二十	商业志	(360)
卷二十一	粮油志	(361)
卷二十二	经济管理志	(364)
卷二十三	财政金融志	(368)
卷二十四	文化志	(371)
卷二十五	教育志	(376)
卷二十六	广播电视志	(379)
卷二十七	文物志	(380)
卷二十八	风景名胜志	(384)
卷二十九	医药卫生志	(386)
卷三十	体育志	(390)
卷三十一	科学技术志	(391)
卷三十二	宗教志	(397)
卷三十三	人物志	(399)
卷末	(399)



初探藏区喇嘛教与社会主义 环境相适应的问题

朱成源

佛教在公元前后（东汉初）逐渐传入我国，至今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从魏晋隋唐到宋元明清，佛教在我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承袭外来佛教，逐步走上了融合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而形成具有特色的汉语佛教。在元明以后，佛教的一个支系“藏语佛教”在我国藏、蒙等少数民族中发展起来，并逐步取得政教合一的统治。在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渗透到人民生活当中，成为藏民族唯一正统的思想。而藏传佛教的不断发展、融合、完整，进而在藏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观念形态，艺术形象创造等方面，无不打上藏语佛教的烙印。

喇嘛教在学术著作中称为“藏传佛教”，也可以说是西藏化的佛教。但喇嘛教又有一些特殊制度，如：“活佛转世”，它的一些教派，均为其它地区的佛教所没有。“喇嘛”，藏语意译为“上师”或“上人”，藏人称一般僧人为“扎巴”，而对高僧才称喇嘛，但后来也尊称扎巴为喇嘛，

于是人们把这些叫作喇嘛的人信奉和传播的宗教称为“喇嘛教”。印度佛教和汉语佛教几乎同时于公元七世纪中叶传入西藏，并与西藏原有的原始宗教——本土教，经过长期斗争、融合，使佛教在西藏得到了弘扬。并由此派生出众多的藏语佛教教派。诸如，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等，代表着不同的奴隶主之间的利益，互相诋毁，长达六百年历史。直到公元十七世纪中叶，宗喀巴对藏传佛教进行改革，挽回了喇嘛教已经出现的颓势，黄教寺院集团才在藏族社会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并于元朝初年传入内地，成为元朝的国教，至此，喇嘛教进入极盛时代。喇嘛教在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大力提倡和历代封建中央政权的扶持下，逐渐发展了庞大的寺庙僧侣组织，拥有独立的、雄厚的寺庙经济，并建立等级森严的封建教阶制。上层喇嘛与世俗封建主阶级（农奴主、贵族、土司头人等）相互勾结，把政权与神权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僧侣农奴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藏族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喇嘛教和喇嘛寺，对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惯无不产生巨大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初期我国共有喇嘛寺五千多座，以宗教为职业的喇嘛有四十余万人，平均占信教各族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在藏区占藏族男子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从中可以看出，在藏族聚居区域内，几乎是全民信教。上层喇嘛与世俗封建主阶级利用喇嘛教，编织成一幅痛苦、压迫、虚伪的网络，束缚着藏民族的思想，严重阻碍了藏族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应该看到，喇嘛教在一些具体的时间和环境中为维护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抵御帝国主义入侵起过或者间接起过积极作用。

用。上层喇嘛阶层的存在，一方面扩大了社会寄生阶层的人数，不利于藏族社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它也扩大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在藏族原来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分工对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喇嘛教为宣传佛教，大量的译经，带来了宗教神学思想、语言学、逻辑学、药医学、天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无疑对当时比较落后的藏区文化的发展起了启蒙作用，刺激了藏族语言文学和印刷技术的发展。如著名的《萨迦格言》就是萨迦派的萨班·贡噶坚参的杰作，自问世以来一直成为藏族人民妇孺皆知的生活教科书。同时，喇嘛教也曾举办了一些经堂学校。培养了一批藏族知识分子，这在客观上也发展促进了藏民族的文化事业，推进了藏民族与祖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藏语佛教兴起、发展的事实证明：喇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一部分，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思想文化史，写下了光辉夺目的一页。沿着藏传佛教的发展轨迹，从它的历史和现状，从藏区喇嘛教现实的地位和发展趋势，我们可看出：喇嘛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现阶段仍有有着一定的社会力量，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都有过较大影响，有时甚至会成为社会的严峻问题。因此，探索和研究喇嘛教怎样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环境相适应的问题，就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喇嘛教能不能与社会主义环境相适应？怎样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适应？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喇嘛教与社会主义环境一定程度上相适应的可能性和实践性的探讨。马克思主义从科学的共

产主义世界观出发，精辟地阐述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发展、消亡的辩证规律，从而奠定了以唯物主义为根本基石的科学宗教学，成为我们研究宗教的指南针。但对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环境怎样相适应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无法找到现成的答案，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差异纷繁复杂的情况，更是没有现成答案。因而，对于这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就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严肃课题。我认为喇嘛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环境相适应，是因为：

一、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仍将长期存在

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上帝赐与人类的完美无缺的“天堂”，而是从旧的社会制度下脱胎出来的社会，尽管社会主义以朝阳般的生命力，朝气蓬勃地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但是它的存在和发展却只有在旧社会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因此，社会主义必然受到旧的社会生活和旧的社会意识的影响，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也还没有达到人们所需要的的那种程度，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病，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从一个十分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在它的身上还残留着旧社会的烙印，带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并影响着社会主义的建设，束缚着我们的思想。虽然，经过我们三十几年的努力创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得到了充分的更新，现代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大国来说，目前生产力的发展，先进生产方式的应用，是极不平衡的。当我们豪迈地向宇宙空间、电

子技术、遗传工程进军的时候，“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仍然在一些地方存在。大自然降临给我们的灾难，我们还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征服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然力量的压迫”我们仍然是软弱无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为我们展示了较为“明白而合理”的现实，但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不同层次的系统，不同民族、或者相同民族不同地域，其生活方式、心理因素，文化素质等都无一雷同，这就涉及到诸如伦理道德、婚姻家庭等问题。这些既受到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情操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受到旧的思想、道德、情操的影响和制约。又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道德品质的差异，在整个社会生产还不十分发达的现实社会中，就容易使许多人产生诸如“运气不佳”的宿命思想。而这些就往往成为“宗教反映的土壤”。

另一方面，作为“宗教反映本身”的宗教文化，必然存在于社会主义环境中，并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藏区，由于喇嘛教意识的长期影响，整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有着浓厚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这种浓厚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又和藏民族的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相互照应，结出欢乐和痛苦、丰收和灾难、希望和失望的宗教艺术“花朵”，入世的思想和出世的思想共同凝结和养育着这种“花朵”，而这种艺术花朵的“芳香”仍然保留至今。这种形象化了的宗教意识，较之“涅槃”境界的顿悟本性就更加具体、直观；其影响就更为广泛、深刻。如佛塔寺院精湛的建筑雕刻，绚丽多姿的壁画，神态逼真的酥油捏象，喜庆丰收的祝福歌舞，点燃柏香的和平祈祷，这些有着浓烈宗教意识的艺术和艺术活

动，充满着感染力，对藏区人们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它又是藏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它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往往又超出这种文化艺术的本身。因此，作为“宗教反映本身”的宗教文化，必然存在于社会主义环境中。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全体中华民族团结一致、长期奋斗的艰巨事业，因而，民族团结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性问题之一。维护民族团结，这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要求。由于种种原因，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喇嘛教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成为藏族人民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深厚的宗教感情，就同民族感情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如果粗暴地伤害这种宗教感情，必将波及民族感情，损伤民族自尊心，造成民族隔阂和民族分裂。因此，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维护这种“宗教感情”，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在社会主义这个漫长历史阶段中，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宗教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宗教反映的事实基础”和“宗教反映本身”，但经历了这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以及在这种深刻的大变革的背景下，宗教也不可能不发生重大的变革，宗教的这种大变革就可能导致与社会主义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的相适应。这种可